

顾潜 / 著

▲一部独特的、极具
价值的个人生命史
▲一部记录中国社会
变迁的珍贵「民间版本」

从红色青年到思想者的真实历程

山西人民出版社



顾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全国多所新闻传播院系兼职教授。

曾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三”，青年时代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最跌宕、激烈的曲折和变迁，获得了正反两种思潮的最深切的体验和辨识力，锤炼了求真求实的品格。曾在工农、基层中苦心志，劳筋骨；后从事新闻工作时，接触、采访过无数从名流、高层人士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社会有切肤了解。

近30年来，一直从事新闻宣传、教学和编辑工作，曾发表过数百万字的新闻、文学、电视作品及学术论文（著），其中有的获国际电视节大奖、全国性奖、上海市奖等。个人撰述和参与编著、主编出版过多部专集、专著，其代表性著作《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在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获广泛影响和好评。由其策划、责编的《新闻学概论》（李良荣著）等十种新闻传播类图书，被评为全国高校“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其个人夺得全国出版界编辑、出版新闻传播类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桂冠者。

兼有文理科复合型学科背景，接受过系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双重熏陶和传承，得益匪浅，使其能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不断地追求学术、创作和思维上的创新及成果。

专擅并关注于：中西方新闻传播比较、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纪实类、传记类的文学性、电视纪录性叙事；对“老三届”以及同代人，在情感和学理层面上，也不断地予以观照和深望。

顾潜 / 著

▲一部独特的、极具
价值的个人生命史
▲一部记录中国社会
变迁的珍贵「民间版本」

从红色青年到思想者的真实历程

山西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经历同一时代的人们，
献给今天的青年朋友，献给我们的后来人！

苦旅者不寂寞

[序一]

萧关鸿

读完《苦旅》，我想对读者说，虽然这不是作者的学术专著，却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用他40年的生命写成的。

这不是一本杂著，而是他的思想自传，甚至可以说是一代人的思想自传。

我与他是同时代人，因此，他书中记录的思想历程，包括那个年代的口号、用语、情绪，甚至细节，都会勾起我的记忆。

其实，不仅因为我们是同时代人，更因为我们当年生活的社会形态是封闭的、单一的。就像我们当年的衣服只有一种颜色一样，我们的经历几乎没有多少差异。所以，我们会有共同的欢乐与痛苦，也会有相同的体验与记忆。

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总是那么沉重。时代已经改变，社会已经开放，生活已经变得轻松而又刺激，但这代人还是活得那么沉重。

两个朋友相逢，三句话就聊到工作；一帮人吃饭，酒过三巡，话题一定是政治。就是到歌厅唱歌，他们挑的还是《血染的风采》。是本能还是下意识？

就像这本书的副题所写，从“红色青年”到“思想者”，这段思想历程铭刻在他们人生中无法磨灭。

社会改变了，他们仍然无法改变，或者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以此为荣。

这代人以“思想者”为荣。40年前，当顾潜开始写日记时就似乎有一种想做“思想者”的味道。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那不是“思想”，只是教条。只有当思想解放的时代到

来时，我们才可能有一点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虽然我们的思想已经冲破牢笼，但是，在笼子里呆久了，我们思想的翅膀飞不高飞不远。

我们只是“思想者”，不会是思想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先天不足。也是我们无法弥补的缺憾。

可能，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缺憾。

“这个时代追捧明星，不追捧思想家。”在一些人认为。

没有明星的社会是冷清的，但是没有思想家会是寂寞的。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兴高采烈地生活，少数人的寂寞无关大体。生活照样前进。

所以，有人读韩寒，有人读“博客”，也有人读《苦旅》，如我之辈。

《苦旅》能够面世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到《苦旅》之类也无法出版，那才真正是寂寞了。

（作者系著名作家、文汇出版社社长、原《文汇报》“笔会”主编）

个人生命史的 叙事给人的激发

[序二]

于海

顾潜先生长我几岁，但我们仍属于同时代人，在理想主义盛行和伟人政治的时代，同代人的个人经历太多相似，如我们一同去串连，一同上山下乡，一同来筹划革命过后的世俗人生，等等。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在当代中国的脉络中，毛泽东设计了第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与社会，所以有如此自觉的运动政治，造就了一代“红色青年”。

读顾先生的《苦旅》，曾亲历的场景与事件随着作者的日记、诗文一一活动起来，宛如现场般生动，因为他所经历的我几乎无不经历。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是用观念论传统的解释学从大处说历史，我更愿意从个体生命史来发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涵。个人的亲历参与构成了个人现今的人格，所以读起来，已经是以历史的构成的现代主体来透视解析历史上在场的主体，往事就获得了当代史的意义，所以可以见出“从红色青年到思想者”的转变。

这一转变跨越了40年。这里是作者1966年11月25日的文章，记述了一个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的心情：“我饱含着满眶的泪水久久地凝视着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日日夜夜思念你，千声万声呼唤您……我在主席的眼下生活了4个小时，这真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幸福！”

读这些话我不觉肉麻，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感受，但今天的青年会怎样看待对领袖如此热爱的“红色青年”？他们会说这不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他们会说“红色青年”红得没有思想和判断力。是的，毛泽东后的中国，不再有政治领袖崇拜的土壤，今天的青年也不会对政治如此狂热，政治回到了日常生活，生活中的红色与革命的联系越来越弱，更多的是象征欲望的燃烧，确切说是由革命红变为欲望红，而越来越粉色。今天很容易用粉色的年代来嘲笑红色的年代，我也无意为之辩，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我们要有合适的历史空间安放“红色青年”。那个红色的时代，为几乎所有的青少年浸染了红的底色，街头到处可见红色的标语和充满红色内容的宣传画。一到“五一”和“十一”，整个城市更变成红色的海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时代精神和气质会将人性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元素激发张扬。我得承认，直到今天，居然还有活跃的成分积淀下来！有人戏谑，一个人20岁时不知社会主义是没心没肺，而当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就是没头没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人20岁不知社会主义只是没头脑，而到40岁时还不知社会主义那才叫没心肺！一个时代只有理想主义只有乌托邦，会有使精神苍白空洞之虞，我甚至想说红色青年的“红”确红得简陋和苍白，其更严重的后果是当不纯不齐的现实成为生活中的坚硬事实后，理想常常破灭而完全不相信崇高和理想。但没有理想和乌托邦，生活，无论是甜腻腻的，还是忙碌碌的，还是琐碎碎的，人会完全满意吗？我不想说没有乌托邦人与动物何异的极端话语，但我仍然要引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弗兰克的话，说明任何人都有对超越性意义的内在祈求：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弗兰克：《活出意义来》，8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今天的时代自然不同于“红色青年”的时代，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第二个现代性规划。它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第一个，它恢复了感性权利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感性的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发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07~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所以有周星驰的无厘头，本不足为怪。但少了点崇高，或英雄的声音被汹涌的搞笑淹没了，这才会造成一个民族的集体缺钙。我理解作者的心路，从红色青年，走向思想者，不是要告别理想抛弃崇高，而是走向有合理的思考和平衡的人生追求，是致力于保持理想主义热情的专业贡献。在40年的后30年，因为红色的底版犹存，作者的心头依然跳跃着理想主义的火花，这一条红线在作者

投身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追寻五四老人、老一辈革命家的踪迹的采访中延伸着、发展着。还因为从轻信、狂热和极左思潮中走出来，恢复健康的常识，掌握了科学的系统的学理，一个思想者的质变发生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真理的追求，对现实的叩问，使我的胸臆充溢理性的思风，我的话语表达承满了社会的观照和人文的情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访经济学家蒋学模）、《对极左思潮下一种负面文化现象的反思》（1989年）、《中国现代化与新闻改革的深化》（2003年）、《敬畏我们内心的道德律》（2005年）等，按时序伸展出一条思想者的理路，深化着专业的审视、理性的解析。我们依然感受到道德的热情，但不再是缺少批判的一味热情和大而无当的口号。最后一篇文章敬畏道德律云云，与之对仗的还有一句是“头上的星空”，人文道德和自然星空都有其庄严的律令，但一个亲切热烈所以人文，一个客观静默所以自然，两者相对而相谐、相得而益彰。在理性主义时代成熟的作者，不再会一任道德热情泛滥而迷失方向，因为有客观理性的光芒，用作者自己的依然热烈的话语：“走出迷雾的思想者在彻悟和反思中迈向深邃的远方……”

40年的历史，对个人，是大半，对中国，是大变。诗人说每一个墓碑下都书写着一整部世界史。这话在社会学家听来总有几分夸张和煽情，但我承认它比“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包含的“帝王史观”更让我心安，更为接受。作者把40年里留下的文字痕迹编撰成一个文本，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原生态的史料，因为有了取舍，这就是建构，并且作成个叙事。常识认为，任何叙事都是对叙事对象的言说，所以是第二级的。留下的任何叙事只是痕迹，史学家的工作是从作为痕迹的鸿爪去还原已经离去的飞鸿。

顾先生的《苦旅》，会让治思想史社会史的学者兴奋，他们从一个“红色青年到思想者”的轨迹中，可以读到群体心理的嬗变、政治文化的演进、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流行话语的裂变。《苦旅》的出版正是时也。但我还是要说，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叙事本身的结构也许比叙事摹状的对象结构更重要更有趣，《苦旅》的价值，不仅是史料的，而且是文本的和话语本身的意义。康德以后，尤其是福柯以后，不再有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将叙事对应的世界看成是去叙事的或与叙事无关的。人是通过叙事去感知体会世界的，透过叙事及其结构，是我们获得世界现实感的主要方式。这样，我们面前的这本人生命史的叙事，就会激发出许多有趣的研究和想象来。多少年前，一包家书从芝加哥临街的一个窗口被人扔向大街，被路过的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碰个正着，他从这些极其私人性的信笺里读出了许多东西，最后加上其他的资料和研究，与他的合作者成就了一本伟大的著作《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

我期待像《苦旅》这样有价值的个人叙事，会启发出同样有价值的社会学的叙事来。这是我乐意勉为其难为朋友顾潜教授作序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寻求历史的领悟

[自序]

顾 潜

岁月悠悠，演绎着生命之河的流变，转瞬间，竟有了“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感觉——回顾人生道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心路作一番反刍、梳理和审视。

这里收集、选编的是 1965~2005 年这 40 年间本人的部分日记、随笔、杂感、对话录以及诗歌。这是我前半生思想历程的真切写照，是一个时代亲历者具有个性的见证。

这 40 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多舛、风云际会的年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风雨兼程、饱经悲喜忧患的年代。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这一代，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今夜有暴风雪”（知青大返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出国潮、市场经济大潮、国企大转制……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事件、大动荡，目睹了整个社会从人的观念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天翻地覆的巨变。我们从一个封闭的社会渐渐转型为开放的社会，我们从一个游离于国际社会、与其格格不入，并以“解放”西方国家自诩的孤傲国度，渐渐迈向国际化的进程，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更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迎四方来客，拥八面来风，开始融入国际社会。

回眸这 40 年的途程，怎能不感慨万千：我们的党进步了！我们的国家进步了！我们的民族进步了！

这 40 年是中国当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映射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探

索文明、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九曲回肠，上下求索，无所畏惧，坚苦卓绝，悲喜交加，奋然前行的壮烈图景。这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彪炳千秋的创业史、发愤史、悲壮史啊！

二

总结历史会让人睿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是吗？当年，当代推行极左路线的罪魁祸首“四人帮”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就绝不是中国几千年“胜王败寇”的简单轮回。今天，当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世界为参照系，就会极其深刻地体认到：如果当年让“四人帮”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必将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准宗教、神学的极端，我们将失去国家走向强盛，人民进一步获得幸福、自由的极好契机。

上帝没有让这批疯子和骗子得逞。我们庆幸历史把邓小平重新交还给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漩涡曾把他三次“吞没”），时代把邓小平推向了中国生死存亡的岔路口。正是邓小平总结、吸取了我们党和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经验、错误和教训，才有极具深远意义的、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有改革开放的决策，才能有今天国运昌盛、经济跨越发展的局面。借用邓小平对毛泽东创立新中国的历史功绩的评价：没有毛泽东，也许中国人民还在黑暗中徘徊。——同样，没有邓小平，也许中国人民还会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下遭受磨难。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他的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就是让他们知道历史，了解历史，领悟历史，才能使他们在设计、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时，会像邓小平那样的前辈革命家、政治家们，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构建新时代政治、社会大厦的潜在精神激素。“只有不知道历史的人才会认为历史不会重演。”（张抗抗）这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呵！

三

作家冯骥才说过这么一句话，给我启发颇深。他说：“历史拒绝怀旧。”是的，怀旧虽然是一种人生情感，一种感情需要，然而，如果仅仅出于怀旧的目的，我就不会展露我青年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写下的日记和心迹，因为用现在的观念或由现时代的青年去阅读这些内容，会感到荒唐和不理解。所以，正因为我的

目的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让后人寻求历史的领悟，故而把它们奉献给社会。“如果我们用一种人生的情感模糊了历史的追究，那么，我们才真正是辜负了那一代人的苦难。”（冯骥才语）

记得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曾深深震撼过许多青年大学生的心灵。“父亲”在烈日下艰难劳作而又毫无哀怨的充满慈祥的形象，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发愤的原动力。这是“悲剧教育”在起作用。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改革既需要一代青年创造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需要青年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韧的素质。我们“需要在全民族的性格中注入一种强烈的悲剧感”。（恩格斯语）极左思潮在一个时期中的肆虐，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确实是一场“悲剧”，它完全可以作为弥足珍贵的“悲剧”性的教材，让年青一代长久地怀有深沉的忧国之心和炽热的报国之情，把青年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马克思语）

四

这40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好思索的习惯（诚然，有一段时期我同大多数人一样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后来编辑、研究、教学工作十分繁忙而无暇记日记（我不愿记流水账）的情况下，也不忘撷下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的火花，然后隔一段时间用随笔和诗歌的形式整理一下。因为“诗言志”，因为凝练的词句更可浓缩哲理和睿智的精华。今天，我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就成了我思想的轨迹，心路的历程。

余秋雨先生曾把他的一批散文结集为《文化苦旅》，借用一下，我的这本集子可称为“思想苦旅”。这倒不仅指它的跨度长、年代久，而是从这条人生长路中，可见出我从热情、纯真、迷惘，一直到反思而获得理性的力量，特别在本书的“下篇”中，渗入了我深深的思索和孜孜的探求，记录了我在思想的旅途上扬弃图新、艰苦跋涉的境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们常常为社会、为苍生而忧患，为忧患而生存，但往往又在忧患中感到痛苦。他们对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或曰终极意义，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怀，但在道统者的威武下，却常常会不堪一击，招致精神摧残甚或肉体折磨。然而，他们却依然会前赴后继，九死而不悔。因为“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 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 去取得 /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 / 我亲爱的祖国！”（舒婷）

五

一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朋友，得悉我要编这样一本集子，都非常感兴趣，他们共同感到了它的“亮点”：这是这段历史的极为真实的见证，是两个时代和历史转折时期异常真切的记录。用新闻学的话语说，目击式的新闻最具时代感、最珍贵。这是一部共和国40年发展史的“民间版本”，它剔除了公开传媒上受到媒介人价值观和评价活动影响的成分，以极具个性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的面貌，走向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是一本“编选”性质的集子，尽管它里面的内容都选自我亲笔写的文章，且全部保留了原貌，然而，由于视野的差异等等的原因，它只能有所取舍，有所忌讳，有所割爱。愿它对这条轨迹的伸向远方不要有太多的模糊和影响。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官场的角度俯视，我是“书生意气”；从市场的角度斜视，我是不可理喻的迂腐文人；从社稷的角度仰视，我是她忠诚的赤子；从天下苍生的角度平视，我是他们的挚友。

个人终将官场遁迹，门前势将冷落“车马稀”；金钱、财富毕竟身后物，百年便是“转头空”。唯为人类和文明的进步有所奉献，以自己的思想、精神为遗产，“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托尔斯泰语），他们的精魂将会与青山同在，后人会在他们的遗骸前感极而一洒热泪……

2006年初秋于复旦大学

目 录

苦旅者不寂寞(序一)	萧关鸿(1)
个人生命史的叙事给人的激发(序二)	于海(3)
寻求历史的领悟(自序)	顾潜(7)

上 篇

一、激情与迷茫(日记与诗文选:1965年5月~1976年10月)

时代大背景 (3)

有人说,现在许多书、杂志的封面上都是毛主席的像,唱的歌也是歌颂毛主席的,好像有点个人迷信。讲这种话的人,不说是反动,至少是和现代修正主义一鼻孔出气的人……人民群众认识到了毛主席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们在完全自觉的基础上,学习毛主席著作……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大战争,在全世界推行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要我们放下武器,和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如果这样,我们的祖国又将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时时用毛主席的话来警戒自己,天天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这样才会逐步克服和改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七一”抒怀(1966年7月1日)	(45)
我坚信……(1966年7月4日)	(46)
记一场说理斗争大会(1966年7月7日)	(47)
坚持“双百”方针(1966年7月13日)	(48)
大海遐想(1966年9月22日)	(49)
见到毛主席(1966年11月25日)	(51)
在革命的大风暴中经受考验(1966年12月6日)	(52)
远行歌(1968年7月7日)	(54)
到广阔的天地中去(1969年4月~5月)	(55)
《马克思传》充实了我的生活(1970年6月)	(57)
雨露滋润(1973年5月9日)	
——献给农场政治学校第二期马列读书班结业典礼	(61)
啊,多瑙河!(1974年5月25日)	(62)
献给革命先烈(1975年4月12日)	(63)
敬爱的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6年1月9日)	(68)
悼朱德同志(1976年7月7日)	(73)
忆峥嵘岁月(1976年6月~7月)	(75)
忆秦娥·哭主席(1976年9月20日)	(79)
欢腾的夜(1976年10月14日)	
——闻粉碎“四人帮”喜讯纪实	(80)
胜利的日子(1976年10月24日)	(83)

下 篇

二、追寻与叩问(访谈录及随笔选:1977年5月~1989年3月)

时代大背景

(89)

过去和今天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懂得,现代意义的民主是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进行的民主,决不能用“四大”之类的“大民主”,使“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同时,我们应继续倡导人人讲真话的良好风气,唯有讲真话,讲

实话,行使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我们的祖国才不会被阴谋家、野心家投入血腥恐怖之中,我们的民族才不再沦于浩劫,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才指日可待……

新闻媒介对个人迷信的长期宣传,大大强化和巩固了那种忠于君王、迎合权力的传统文化心理……使无数人的人格受到了扭曲,灵魂套上了枷锁,使许多人一度陷入了愚昧的境地,使“造神”这一文化现象在现代中国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 揭批“四人帮”(1977年5月) (90)
-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发扬“五四”精神(1979年4月22日)
- 访“五四”亲历者、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 (91)
-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6月2日)
- 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访谈录 (92)
- 采访刘少奇小女儿刘潇潇实录(部分)(1981年6月2日) (94)
- 八千里路云和月(1982年9月1日)
- 复旦三好学生暑期考察散记 (96)
- 把“小我”融化到“大我”中去(1983年11月15日)
- 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开展“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读书活动 (99)
- 北京两章(1983年12月26日) (101)
- 因势利导 促进改革(1984年10月10日) (102)
- 我们的血性(1985年12月3日) (102)
- 美哉!特区建筑(1986年10月11日)
- 南国遐思之一 (104)
- 伫望伶仃洋(1986年10月31日)
- 南国遐思之二 (105)
- 沙头角掠影(1986年11月10日)
- 南国遐思之三 (106)
- 新闻界的拓荒者(1986年11月19日)
- 南国遐思之四 (107)
- “新闻沙龙”——一股甘冽的清泉(1986年11月29日)
- 南国遐思之五 (108)
- 香港电视一瞥(1986年12月9日)
- 南国遐思之六 (109)